

# 于右任:元老记者 为国立报



于右任(1879-1964年):原名伯循,字诱人,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陕西三原人。近代政治家、书法家、教育家、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创办多份革命报纸,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交通次长,后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三十多年。与好友刘觉民等人先后创办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等高校。精于书法,尤擅魏碑、楷书、草书,首创“标准书”,被誉为“当代草圣”。他是南社早期的诗人,一生写下诗词近900首。

## 《国立报》概况

1910年10月11日,《国立报》创刊于上海,报馆设在公共租界。于右任为社长,主笔为宋教仁、范光启、景耀月、章士钊等,经理吴忠信、邵力子。又得沈缙文、庞青城、张人杰等的财力支持。特设《民贼小传》专栏,专心揭露各级官吏贪劣卖国,于右任、宋教仁分别以“骚心”和“渔父”为笔名撰文,轰动全国。1913年9月被袁世凯勒令关掉,出刊总数成功超越了一千期。该报与《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一脉相承,被合称为“竖三民”。

于右任从年轻时开始蓄须,从黑到白,长髯飘飘了一辈子,同仁后辈尊称髯翁、右老,民间百姓则直呼其为于胡子。

髯翁广为人知的名头有两个:一个是国民党元老,另一个是书法大家。他还有一个少有人知的名号:元老记者,从1907年到1910年,他主持创办了四份日报,其中《国立报》在辛亥年间成了沪宁革命党人鼓吹暴动的喉舌,报馆也一度成了党人们聚集密议的“窝子”。

于右任是因办报才加入革命党。1906年4月,于右任东渡日本,为创办《神州日报》做考察准备。经陕西乡党介绍,时年27岁的于右任结识了40岁的中国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孙中山本人就是个办报狂人,一生创办了十多种报刊,坚信“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他很赏识这位立志办报的年轻举人,顺手开了一张大大的空头支票:委任于右任为“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的同盟会事务。

考察于右任的办报思路,其与孙中山的宣传思想并不完全一致,或者可以这样说:于右任是党人其表,报人其里;孙中山则是位彻头彻尾的革命家和颠覆者。让我们把视线从1911年向前移动4年,看看于右任“元老记者”的名号是如何获得的。

## 妥协与坚持

1907年4月,于大都督的《神州》在上海创刊,日出三大张,新闻和广告各占一半。当时的上海报界,保皇和立宪立场占主流,新出炉的《神州》显得火药味十足,虽然帝王仍居帝都,但报头还是弃用了光绪年号,改用干支和公元纪年。于右任亲自为报纸写社论,猛批君主立宪,认为这是一种虚伪的、荒诞的政治欺骗行为。新

闻版标明“有闻必录”,细看多为起义、暴动、革命之类的消息。革命党人和同情革命党的人都很喜欢这一定位,亲切地称之为“炸弹”。《神州》的发行量很快突破一万份,第一次办报即获成功,如果不是是一场意外的大火让于右任主持的《神州》停在了第八十期,他就不必再辛苦创办第二、第三、第四份报纸了。

于氏的第二份报纸《民呼日报》创刊于1909年5月,他亲任社长,解释办报目的无非“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仍定位于“揭露清廷黑暗统治,鼓动发起民族革命”。内容和栏目设置较《神州》更丰富了一些,专论之外,还有诗话、艺苑等比较轻松的栏目;表达形式上,文字之外,以讽刺画为主的图画增多了。这些技术上的变化,让报纸看起来既革命又轻松,报纸刚出版订阅者已达数千人,三个月之后关张时发行量已过一万份。

清政府地方官员用“间接诉讼”的方式关闭了《民呼日报》。当时于右任和一些旅沪陕甘人士发起成立了一个“甘肃筹赈会”,为家乡饥民筹款救灾,办事地点暂借《民呼日报》报馆。当时陕甘一带连续三年灾荒,饥民遍地,易子而食,《民呼日报》报道了这一惨状,猛批陕甘总督毛庆蕃为保官职匿灾不报、田赋不免的恶劣行径。毛总督大怒,决定对于右任实施跨省追捕,以《民呼日报》涉嫌侵吞赈灾善款为由,致电沪道蔡乃煌,要求严查该报社于右任。蔡道台心领神会,迅速商请租界当局,对于社长予以拘捕。前后经过八次堂审,主持审判的官员几近明言:如果你再办报纸,就要挖掉双眼;只要你停办报纸,即可重获自由。于右任热爱报纸,也热爱自由,经过半个月的坚持,于右任妥协了,《民呼日报》停在了第92

期上。

但于社长的妥协显然是为了更长久的坚持,出狱后的第五十天,他又创办了《民吁日报》,这次他请范鸿仙任社长,自己在幕后主持。他解释报名的含义:呼就去掉两点,相当于已经挖掉了双眼;不允许大声疾呼,不出声地吁一吁总是可以的吧。为了让报纸活得更久些,于右任大幅度调整了报道方向,不再集中关注国内时事,而是着重报道对外关系和国际局势。

事实证明,只要“反满、革命”的定位不改,报道方向再怎么调整都于事无补,任何报道都危机重重,涉外报道甚至更危险一些。《民吁日报》死于一篇涉日报道《锦齐铁道及远东和平》,揭露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引起了日本驻沪总领事的不满,函请上海地方官员查封该报,中国官员照办了。《民吁日报》存活的时间更短,只有48天。

## 从报人转型政治

从前三份报纸的生与死中可见,于右任屡败屡战,善于妥协但绝不投降,办报的“韧性”盖过了革命的激情,“元老记者”的桂冠戴在他头上,再合适不过了。第四份日报《国立报》的创办,则直接帮他完成从记者转型为元老。

1910年10月,离武昌首义还有整整一年,于右任又当社长了,这次他创办的报纸名为《国立报》,公开宣称:“以提倡国民独立精神、培植国民独立思想、建立独立之民族和保卫独立之国家为宗旨”,虽然仍以“国家、民族”等宏大叙事为主导,但对国民个体的重视明显增强了。栏目设置甚至可称得上丰富多彩:设社论、外论、译论、谕旨、宫门抄、专电、译电、新闻、大陆春秋、上海春秋、杂录等等。此时宪政专家兼盟盟

袖宋教仁刚刚从日本回国,策划反清暴动之余,还兼任《国立报》主笔,以渔父的笔名,发表了多篇介绍政党政治、责任内阁等西方宪政基本常识的文章。

很快于右任和《国立报》一齐进入了1911年。此时的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已经烂得差不多了,沪上地方官员们的精力更在于自保和互保,无暇顾及报章上的异义和杂音。革命党人云集的《国立报》火药味十足,胆子越来越大:“战胜政府”、“改造中国”、“冥顽不仁之政府”、“倒行逆施之政府”等颠覆性言论随处可见。一些激进的党人们甚至不满足于写写骂骂,曾代替于右任做过《民吁日报》社长的范鸿仙最具代表性,武昌首义成功后,他立即放下曾被孙中山誉为“可抵十万神兵”的笔,投入光复上海和收复南京的实战之中,成为沪宁战事的关键先生,1914年死于非命,孙中山痛心不已,发誓革命成功之后为他实行国葬。1934年蒋介石替孙总理兑现承诺,将范大将军国葬于中山陵东侧。

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传到沪上之后,《国立报》成了沪宁一带同盟会首领们的聚集地,陈其美、宋教仁等在此密谋起义。不久事成,陈其美任沪军都督。又不久孙中山自海外返沪,首站就来到《国立报》,慰勉革命同志。再不久1912年就到了,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党领袖领袖戴为内阁要员,于右任被聘为交通部次长。虽然这个次长只做了四十天,但这成为于右任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于氏把主要精力放在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的行动上,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一路逶迤而去,官位和名头越来越大,离报人形象也越来越远了。

据《新京报》

# 老人独居悬崖边40年后回家

近期,山西长治县74岁老人李树苗独居海拔2500米高的临汾霍山修仙崖40余年,过着“野人”般的原始生活。如今,古稀之年的他想起老家。9月9日(农历八月十二),在中秋节前夕,老人家乡长治县南宋乡太义掌村的村干部,驱车300多公里来到霍山,将老人接回村里与乡亲们团聚。

## “我要回家了!”

9月9日(农历八月十二),临近中秋的上党,清晨弥漫着轻轻薄雾。长治县南宋乡太义掌村的支部书记郭永德、村委会主任郭正书起得特别早,因为一个七旬老人正在300多公里以外的霍山殷殷地期盼着,等待着回归故里。

早上7点,记者随太义掌村干部从长治市区出发,经屯留、沁源等行经3个多小时,又转向蜿蜒盘旋的山路,颠簸半个多小时,来到临汾霍州市境内的七里峪景区霍山脚下,整个路程近一半都有雾,开车小心而迫切。

遥望霍山,山势险峻,悬崖峭壁,山路狭窄。一行十余人不得不弃车徒步,沿陡峭的山道穿行于松林灌丛之中。步行近半小时,大家注意到接下来的路可谓“天险”。路开在悬崖边上,唯一的保护就是崖边的栏杆,望着架在悬崖边上的五段折叠云梯让前来的十余人望而生畏。大家胆战心惊地爬上第三道云梯,在陡峭的悬崖旁,一个看似废弃多年的土坯石屋展现在记者的视野中。随行领路的一位七里峪村民说,石屋旁那个衣衫褴褛、头戴帽子的老人就是李树苗。

老人个头不高,满脸慈祥,穿着一身蓝布衣服,黄绿色胶底球鞋,说话声音洪亮,耳聪目明,与记者想象中的因长期生活在山中,满脸沧桑、骨瘦如柴的形象完全不

符。看到接他回家的人已经来了,李树苗老人赶紧跑过来打招呼。

## 家当只装了半个编织袋

马上就能回家了,李树苗老人赶紧跑回几近坍塌的石屋里收拾起了自己的家当。记者紧跟着老人进入了他的石屋,立刻被屋里冒着腾腾白烟熏得咳嗽起来。屋子里两块石头架起熏得发黑的铝锅,下面燃烧着干树枝,锅里正煮着什么,记者揭开锅盖一看,原来里面煮着山蘑菇。

老人所谓的家只有不到6平方米,东墙为崖壁,剩下的两堵半墙为石头和土坯砌成,树枝搭的屋顶破了两个洞,其中的一个洞已被老人用塑料布简单地堵上。屋内没有一件家具,4根木棍并在一起就是老人的床,硬纸片为被褥,守林人为他留下的一件军大衣当做被子。在一个墙角,零乱地堆放着两个瓷碗、一个瓷盆和一个油壶。李树苗告诉记者,那都是他向游人讨要的钱买的。

老人先换上游人送给他的新鞋,然后开始往一个编织袋里装东西,一小罐盐、一小桶油、一把斧头……

一个老人,一座山,生活了半辈子,全部家当只有半个袋子那么多。

## 老人挖中草药谋生

李树苗老人非常健谈,虽在临汾

霍山生活多年,但口音依然是不变的长治县腔调。74岁的他一边收拾自己的“家当”,一边与记者聊着自己40多年来的经历。他讲话时思路非常清楚,精神矍铄,看起来并不像一个独居深山半辈子的老人。他骄傲地告诉记者,在40多年的“野人”生活中,他从未患过任何病,感冒咳嗽也是少之又少。这和他精通中草药学和注重平日的“养生”是分不开的。说话间,李树苗老人从墙角拿出一个白色塑料瓶,并从中拿出几个“大薏米”状的东西告诉记者,年轻的时候,他曾有过的咳嗽的毛病,自深居山林后,他每天都用这种中草药材“贝母”泡水喝,久而久之再没有咳嗽过。

据李树苗老人介绍,1964年家乡开展“四清”运动,李树苗的家庭在划分成分时,被打为“富农”批斗。当时的他情窦初开,与本村的一个“大辫子”姑娘相恋,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时任村干部不给开结婚证明最终没结成姻缘。一气之下,李树苗干脆背井离乡,到外地寻求发展。

毫无目的的他一直走过沁源县,离开了长治的地界,来到临汾霍州。初到异乡,没有人知道李树苗的“富农”身份,没有任何压力的他准备大干一场。李树苗先来到七里峪村的一户人家做工,帮人家放牛、养羊,并重新发挥起自己爱画画和做木工的特长,为村里人做床头、木柜,往床头和木柜上画上漂亮的图案。时间一长,十里八乡的村民都知道七里峪村有个“外乡人”擅长木工和画画,李树苗的“客户”也就慢慢多了起来,生活也就有了经济来源。这样的生活维

持了一段时间。

七里峪有座霍山,山上有几千种中草药材。村里人靠山吃山,村民大多以挖中草药材维持生计。年轻的李树苗在家乡时,就认得数十种中草药,凭借认药的本事,他也加入了挖中草药材的队伍,做木工和画画成了副业。说起挖中草药的日子,李树苗略得意。“霍山上的药材有很多,最常见的有党参、黄芪、柴胡、贝母……那时候,我经常早早起床到山里挖药材,下午挑到霍州城药材公司卖钱……”

老人嘴里说着中草药的名字和几乎传奇的经历,神采奕奕,如数家珍。后来听七里峪村的一位老村民说,李树苗挖中草药的时代,可算得上是他的“黄金时代”了,药找得快,挖得多,闲暇的时候还做点儿木工的小副业,常见他住在城里的旅店。七里峪村民的说法,记者在随后和老人的交谈中得到了印证。

## 破土坯石屋住了40年

1979年改革开放后,七里峪村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有的人外出打工,有的人下海经商……那时没有人再找他做木工,更别说是画画了。挖中草药成了李树苗老人唯一的生计来源,生活质量在不知不觉中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以前在挖草药的时候,天色太晚或者下雨,我就躲在‘土匪窝’里,后来没有地方住了,也就完全住在这儿了。”老人口中的“土匪窝”,就是老人居住了40多年的悬崖边上的破土坯石屋。

在霍州霍山流传着一个故事,由于霍山山势险峻,多悬崖峭壁,曾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时期,有

一窝土匪来到霍山,在此安营扎寨,设置了岗哨,还以“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几次在猛烈的交火中大败国民党军。相传,老人居住的“土匪窝”就是值班岗哨的遗址。

生活窘迫的李树苗,将几近坍塌的土坯石屋简单地进行了垒砌,并砍了木条重新铺设了屋顶,开始了完全的“一个人、一座山”的原始生活。平日里还是挖点中草药材、换点钱度日。日子一长,连山上的野兽也把他当成邻居。

老人一个雨夜发生的故事更像一个传奇。李树苗说,十多年前的一个雨夜,他像往常一样蹲在“土匪窝”里躲雨,这时一只被淋湿的豹子慌忙地跑进屋。他当时吓坏了,一动也不敢动。而豹子只是看了看他,便卧了下来,直到第二天雨停后才离开。“可能那个豹子感觉我们不是躲雨的,就舍不得吃我了。”4年前,步入70岁高龄的李树苗再也没有力气天天在密林和悬崖边上找中草药材,开始了在风景区挂牌子乞讨度日的生活。

## 要无偿为乡亲服务

时近中午12点30分,李树苗老人背起自己收拾好的半袋子家当,拄起砍来的木棍随太义掌村支部书记郭永德和村主任郭正书一行准备下山。

晚上8点左右,车辆在太义掌村委大院停了下来。老人在下车的瞬间,高声说道“我回家了”。老人的住处在该村学校后新修的庙内,李树苗表示,他将看好古庙内的文物,并发挥自己能画善画和木工的特长,无偿为父老乡亲服务,作为对村里人的回报。

据《山西晚报》